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

总主编：顾海良 余双好

民族复兴 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战略

阮建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研究

民族复兴 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其成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

总主编：顾海良 余双好

民族复兴 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战略

阮建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复兴 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战略/
阮建平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顾海良 余双好主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ISBN 978-7-307-15129-1

I. 民… II. 阮… III. 外交政策—中国 IV. 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6554 号

责任编辑:詹 蜜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9.5 字数:130千字 插页:4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5129-1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
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的途径、载体和方法研究”项目成果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讨论与战略调整”（11CGJ018）研究成果
 - 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战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



总序言

顾海良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现状，我们编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丛书，它是国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丛书分作十二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为主线，力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重要理论成果作出全面的探索和适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各个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观点，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道路是实现途径、制度是根本保障、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力和聚焦点，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个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任务，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我们希望，丛书能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释中，能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风格，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探索的理论精髓，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发展的新概括和新提炼。能在现实、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上，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发挥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协同上，在中国的现实发展和中国梦的未来憧憬的联结上，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影响力和作用力，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 and 理论自强。

我们希望，丛书能从多方面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导向，对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力量及基本道德规范上发挥强大的推进力；在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和弘扬主旋律上，产生更大的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能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在积极引领社会思潮中发挥中坚作用，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

我们希望，丛书能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形象，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传播中国好声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能把握好“时、度、效”，努力讲真、讲实、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中国情怀，进一步扩大中国道路、制度及其理论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认同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感染力。

丛书是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老师合作撰写的，也是以余双好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的途径、载体和方法研究”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2013年9月10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编 民族复兴

- | | |
|-----|-----------------|
| 003 | 第1章 历史的辉煌 |
| 003 | 1.1 绵延千年的文明古国 |
| 010 | 1.2 万邦来朝的盛况 |
| 015 | 1.3 辉煌的历史地位 |
| 022 | 第2章 百年屈辱和不断抗争 |
| 022 | 2.1 国运中落的百年屈辱 |
| 031 | 2.2 前赴后继的不断抗争 |
| 039 | 第3章 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
| 039 | 3.1 由封闭到开放 |
| 046 | 3.2 由贫穷到富强 |
| 054 | 3.3 由边缘到中心 |

061 第二编 和平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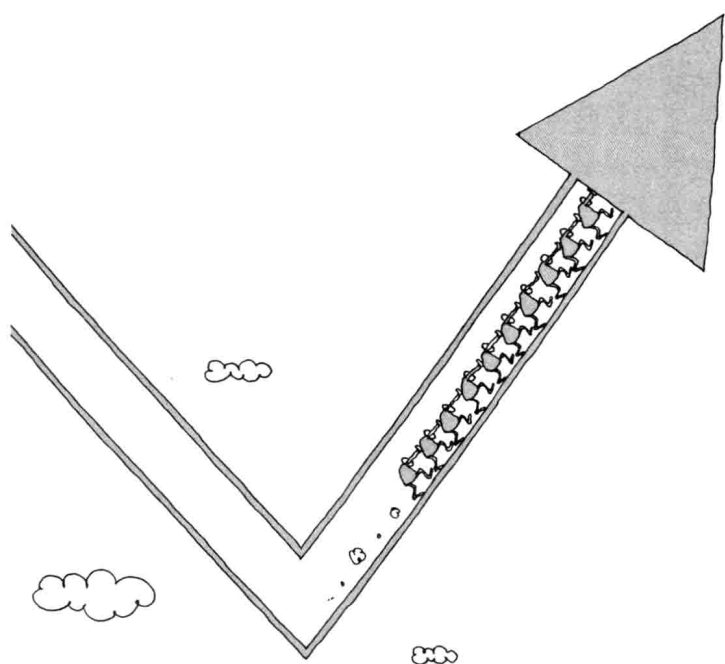
- | | |
|-----|-----------------|
| 063 | 第4章 大国崛起的忧思 |
| 064 | 4.1 国强必霸? |
| 070 | 4.2 权力转移必然导致战争? |
| 077 | 第5章 中国的庄严承诺 |
| 077 | 5.1 源远流长的和平传统 |

082	5.2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087	5.3 时代发展的要求
093	第6章 打破历史宿命的伟大实践
093	6.1 以互信合作求共同安全
100	6.2 以互利合作求共同发展

111 第三编 和谐世界

113	第7章 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价值
113	7.1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软实力”资源
118	7.2 协调一体化进程中多元文明的相互关系
124	7.3 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130	第8章 和谐世界“中国梦”
130	8.1 中国崛起的现实进展和国际环境
136	8.2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创新大国崛起模式

第一编 民族复兴 ● ●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崛起”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最为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但随着对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意识到，鉴于近代以前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复兴”比“崛起”更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当前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陷入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入侵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不知餍足的资本驱使下，先进的近代科技工业与强大的动员组织体系相结合，使建立在传统农耕基础上的封建中国不堪一击。自此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年甚一年，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苦难也日甚一日。

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与此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百年屈辱，百年抗争，百年探索。中国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胜利，扭转了百年的颓势，并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力前行，逐渐由贫穷、封闭走向富强、开放，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日益向中心国家靠拢。

第1章 历史的辉煌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崛起”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最为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2009年底，美国颇具影响的媒体监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通过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的检索发现，“中国崛起”是21世纪以来最为热门的新闻主题。

随着对中国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意识到，鉴于近代以前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复兴”比“崛起”更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当前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未来的影响。

1.1 绵延千年的文明古国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盛极一时的文明。其中大多最后归于灭亡，或消散于新的不同实体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绵延数千年并成功向现代转型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仅令当今很多大国难以望其项背，也是其他文明古国无法相比的。

古印度、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远古文明的重要代表，但最后都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现在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居民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与过去相比，无论在种族，还是文化价值和信仰上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古印度文明消失后，印度地区先后遭到雅利安、波斯、马其顿、安息、穆斯林、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的入侵和统治。古埃及王国灭亡后，也先后受到利比

亚、埃塞俄比亚、亚述、波斯、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的轮番统治，使得这片曾经属于法老的土地、文明、宗教和语言全部流失。在中东，亚历山大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文化。而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在欧洲，取代古希腊的罗马帝国崩溃后陷入了长达上千年的割据混战局面，出现了新的宗教、种族、语系和民族国家。时至今日，欧洲仍然在为实现一体化而苦苦努力。与这些古老文明相比，数千年过去了，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地理范围、语言和文化等方面保持了惊人的延续性和完整性。

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的同一性是以领土的同一性为首要条件，其次才是居民的同一性。只要领土实质上仍然是同一个，国家也就仍然是同一个。国家在时间上的同一性是直接以领土的同一性为根据的，只是间接地才以生活在该领土上的人口为同一性为根据。^①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规范，现代国际法主要是以客观稳定的地理因素作为确定民族主权国家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基础，并以此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民族主权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它滥觞于欧洲近代频繁的战争和社会变迁，普及于西方的全球扩张。从人类历史来看，民族主权国家只是有史以来产生过的众多国家形态中最近的一种。实际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类型的国家。要厘清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必须从地理范围、人口结构和文化传统等视角进行综合研究。

与现代西方的普遍经验不同，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所意识到的，中国不同于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stat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已故的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提醒他的西方同行，“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

^① [奥] 凯尔森著，沈宗灵译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6 页。

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①之所以说中国是一个一脉相承、绵延至今的唯一国家，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文明型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独特的文化传统不断整合周边其他部族，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中国的地理范围，丰富中国的族裔结构。与之相应，“中国”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展和升华，体现出今天中国版图范围内不同文化、民族和地理疆界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这种绵延数千年的历史在当今世界大国中是少见的，在文明古国中更是绝无仅有的。

据文献记载，中国的文明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在远古时期，中国的代称很多，比如“华夏”、“诸夏”、“神州”等。其中，“华夏”一词的使用最为广泛。所谓“华夏”，《左传·定公十年》书云：“中国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据此解释“华夏”，即是“着锦衣华服的礼仪之邦”。“中国”一词被频繁用于统称“诸夏”之国，与蛮、夷、戎、狄相对应。正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②，又有“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之外也，中国内也。”^③

因此，从一开始，“中国”一词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种族或地域概念，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符号来理解，即为天子统治的文明中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种族或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明进化的分界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自宋亡而元立之后，“中国”一词就被历史赋予了更宽泛的概念。明灭清立后实施的满汉融合政策，使得“中国”一词与其最原始的含义渐行渐远。因为本身原是“夷狄”，清朝统

① 转引自金灿荣：《〈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序》，载于[英]马丁·雅克著，张莉、牛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XVI页。

②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③（宋）石介：《徂徕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90册），转引自李懿：《石介〈中国论〉的文学书写与文化意蕴》，载于《船山学刊》2012年第4期，第149页。

治者更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到近现代,“中国”概念逐渐演变成具有现代政治意味的称呼。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的“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中华文明国家的国号。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同样也以“中国”为简称。“中国”成为中华文明的政治载体,其中包括除了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无论是蛮、夷、戎、狄之文明,还是华夏文明,都在现今中华文明之内。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呢?在此,既有地理、气候和人口等诸多客观因素,更有文化、制度等主观方面的原因。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首先是地理因素。一方面,四周的地理障碍,使得中国能够在尽可能避免外力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身文明。早在秦汉时期,就大致奠定了今天中国领土的基础。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基本稳定在自然边界内。东面和南面是难以跨越的浩瀚海洋,西南部和西部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和山脉,西北部和北部是辽阔的荒漠和草原。另一方面,辽阔而肥沃的土地加上适宜的温带气候,使得中国能够供养庞大的人口,这有助于中国文明的延续。据统计,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汉朝就拥有5950万人,比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近4亿。^①

与上述客观因素相比,中国在文化和制度上的独特创造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挥了更加重要的独特作用。传统中国社会曾被称为是一种“超稳定结构”,这种稳定既有赖于它的民众理念,也有赖于它的体制结构。

从历史来看,所有大国的兴起都离不开武力,但没有一个能够仅靠武力延续下去的大国。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很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能够延续数千年,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

^①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姓和士大夫所信奉的一套价值观，而不是历代皇帝的镇压。^①

自周朝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个朝代变化，但基本上都遵循相似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开始到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之前，中国是以地方列国政治分立为特征。但在此之前的上千年里，中国已实现文化的统一。基于对分裂和战争后果的深刻反思，中国将统一与和谐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共识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普及，并在以后历次的内乱中一再被重新强化。因此，虽然历史上中国多次遭受过分裂战乱，但统一最终成为人心所向的结果，由此使中国尽可能避免了欧洲中世纪之后频繁残酷的内战及其对文明连续性的破坏。在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中，国家被赋予一种从家庭伦理道德延伸出来的权力和责任关系，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文明的连续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代表，儒家提出了一套关于个人修养、社会规范和国家治理的系统理论。虽然该理论极力维护一种等级秩序，但也规定了各级管理者应有的道德自律和对下属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责、权、利的平衡系统：一方面强调民众要忠于皇帝的统治，因为这是“天命”；但另一方面，是否有德，是得“天命”和行王道的基本条件。皇帝的“德”在于施“仁政”，保护臣民的安全，尽可能减少百姓的负担，促进社会和谐。如果治理不善，就将失去“天命”，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其目的就是要在一个多样化和等级的社会里维持某种程度的和谐状态。安德里·贝特尔（Andre Beteille）指出：“在一个平衡的系统中，不平等不仅实际存在，而且也被认为是合法的。在一个失衡的系统中，不平等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尽管它实际依然存在”。^② 在这一传统思想主导下，从秦朝到清朝，中国的历代变化主要

① [美]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 页。

② Andre Beteille. *Inequality and Social Change*,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5.